

略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儒学思想

(俄) K.П.卡梅涅瓦 著 罗学鑫 编译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是 19 世纪下半叶重要的汉学家之一, 师从瓦西里耶夫的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判断。本文依托格氏的专著, 主要介绍了格氏对儒学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 俄罗斯汉学; 儒学;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谢·米·格奥尔吉耶夫斯基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以下简称格氏) 是 19 世纪下半叶重要的俄罗斯汉学家之一。1873 年, 格氏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 1880 年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获得硕士学位, 之后又在圣彼得堡大学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 于 1890 年成为该校东方系的教授。

格氏是最早的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俄罗斯汉学家。在其硕士毕业论文《先秦史 (至秦始皇)》(1885) 中描绘了中国周王朝的政治历史。在博士毕业论文《对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分析》(1888) 和专著《汉语字根构成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1888) 中格氏试图向我们展示古代中国人的生活面貌和古代中国文化的起源。在一系列的著作中格氏涉及到了中国精神文化, 儒学的道德准则等问题。这位汉学家的作品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那就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文明以及中国人的生活准则、价值观保持极大的热情和真诚之心。

本文论述的是格氏之后的一本专著《中国的生活原则: 孔子与儒学》(2015), 该书充分分析了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国人的古老信仰, 即祖先崇拜, 第二部分描述了孔子的学问及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1 格氏眼中的孔子形象

在开始分析孔子的学问之前, 格氏引用了其他著名汉学家的观点。比如他的老师——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 (Л. С. Васильев) 把孔子的所有活动归结于“他首次将识字书写能力从贵族子弟中解放出来。他改进了书写方法并将其传授给了中国的下层民众”。(Васильев 2013: 32, 61—90) 格氏将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描述为: “……那个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多神教对祖先崇拜进行了绝对的压制, 古老的生活原则受到消极哲学思想的威胁。人死了, 神圣的财产权也消失了; 国家毁灭了, 基础的宗教信仰也消失了! 历史将孔子的活动与这个悲剧时代联系到了一起, 在其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之所以能够存在百年的基石。”(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 286)

孔子修撰了《易经》《诗经》《礼记》和《书经》。根据格氏的观点, 孔子删减了一些他认为多余或者不必要的内容, 而同时对一些容易被误解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而关于孔

子本人，格奥尔耶夫斯基这样写道：“孔子最重要的身份是道德改良家和哲学家”。这位汉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孔子在哪些方面论证了自己的哲学？他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使命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孔子的话来回答：“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1797）中也写道：“孔子（学习）的方式说出来非常简单，以古人为榜样，建议阅读《经》，并要求你们习惯于思考从《经》中习得的教义。”（Jean Joseph Marie 1776—1814: 61）“孔子要求人们掌握其所传授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智慧。孔子没有在这堂‘课’上添加任何内容，也没有从中删除任何东西，而是保留了其原始的纯净性并将其传承下去。学问是不变的，都是来自于上天的。孔子仅仅是一个种下谷物并给它们浇水的农民，他没有能力培植出幼芽，也不能改变种植方式。”（Jean Joseph Marie 1776—1814: 344—345）

格氏认为孔子本人是一个彻底吸收了古人智慧的人，并成为了这种智慧的守护者、解释者和传播者，并希望能以此来教导同时代的其他人。根据格氏的观点，孔子想让他同时代的人都能够重拾祖先的老规矩，这些老规矩或被遗忘或已经丧失了其本来的含义。孔子认为自己是上天的使者，是执行上天意志的。“但是孔子在复兴古代规矩的同时拥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去表达他个人的想法。古训是昏暗不明的，它需要得到人这种或者那种的解释。如果哲学家赋予了古训某种非常强烈的意义，那么这通常取决于其自身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是源于某种基本、普遍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在获得各种信息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基于某些心理素质所形成的。”（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 297）

格氏同意瓦西里耶夫的说法，认为孔子是第一位人民教师。“在他生命的第三十年，他打开了家门，成为了人们的老师——任何人，无论年龄、职位或者社会地位，都可以来找他并接受他的教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 298）。孔子的学生人数达到了三千。格氏认为，当时孔子并不是“唯一”的将读写能力从贵族子弟中解放出来，完善这种能力并将其传授给底层民众的中国人。他仔细研究了那些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客观真理”。那些思想被孔子的传承人依托全民族的集体情绪和孔子所能认可的原则不断发展。“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孔子的真正面目，而是中国人希望从孔子学问中所看到的东西以及孔子所认为的自己理想具象化的个性表达。”（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 300）

2 格氏眼中的儒家哲学

格氏认为孔子不希望去谈论先验的真理，不会去寻找终极命题的答案，不想去解释有限人类思维无法解释的事情，而主张应该要让信念来支配我们——格氏认为这是孔子思想消极的一面。“对于他而言，自然的伟大和多样性似乎是既定的现实，而在人类常识所能理解范围之外的自然存在的理由和合理性却没有被孔子所思考。对于孔子来说，人死后作为一种需要祭品的灵魂，是一种人们信仰的主观显现，这种信仰既不需要被证明其存在与否，也不需要被证明其有害与否。”（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 308）根据格氏的说法，孔子希望能够成为伦理和政治哲学的布道者，想要澄清每个人心底所固有的原始状态的某些真理。那是在古代人心中习以为常，但是在现代人心因为环境等种种原因而被遮掩起来的深刻真理。

在分析了孔子的言论之后，格式得出结论，即依据儒家学说，人类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形式的二元性和内在的统一性。人的出生和死亡是一种自然活动，具有形式的二元性和物质的统一性。对于这个事实的解释是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是因为自然在细节处展示的活动。“对于孔子来说，人的存在不需要更高级的、先验性的解释：人活着因为自然赋予了其生命，人死了因为自然决定了其寿命。”（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 313）

格氏认为孔子“希望能将其教义嵌套进旧形式之中”，因为人们在大部分时候都对创新

满怀敌意，他们屈服于权威，并喜欢祖先留给他们的东西。因此，孔子在他同时代的人面前是一种古老法则的拥护者姿态。那是一些被遗忘的或者不被了解的古老法则，比如谁将是权力的继承人。人们会去崇拜那种公认的，但同时又存在过的古老法则。

格氏根据孔子的言行得出了以下一些观点：1) 存在一个未知的统一事物，比如自然。2) 事物存在的外在形式具有二元性，比如天与地，而在其内部则展示出两股持续不断争斗的对立力量——阳和阴。3) 人类是自然力量的集合。4) 人类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个体，必须在地球上存在一段时间之后停止其存在。5) 人天生具有自然的本能和需求，并作为自然的产物，为不断满足己身的本能和需求而努力。6) 地球上的人类并不孤单，他们出生、成长和生活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之中。一个人是否完全满足自身的本能和需求还受限于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

3 格氏眼中的儒学核心

格氏认为，孔子对孝道可以这样来解释：父母本质上是每个人生命中最先出现的人，而与父母的纽带也是每个人与他人关系中最重要关系。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与父母的关系成了试金石和建立与他人关系的基础。(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 346) 自然地，一个已经扮演孝敬父母的孩子角色的人，很容易将这种关系投射到跟周围的其他人身上——兄弟或者亲戚，这样一来亲情就产生了。在与所有家庭成员建立起关系之后，一个人便会去努力满足自己最强烈的本能之一——性。这样就产生了爱情和婚姻。当一个人转变自己角色成为一家之主的时候，他最终要处理好自己与社会、国家和全体人类的关系。所有类型的关系都要求具备一些品质，而人应该去发展这些品质，以便不去破坏生活的和谐，去延续自己的生命或者实现自身的幸福。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发展起来某些特定的品质，从而成为一个具备文化素养的人，这些人致力于去满足自身最迫切的本能和需求。通过一些限定的关系，一个人认识到并且谋求去满足自身最迫切的本能和需求的时候，可以认为这时候他的幸福是有保障的。当一个人正确理解了富足的本质并且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时候，才能获得人类最高的幸福（尘世的幸福）。处理关系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某种基础的广度和强度，这种基础就是一个人了解并履行其孝道的程度。因此孝道是人类福祉的保障，是文化和社会进步的基础。

格氏认为古代中国人的信仰（孔子之前的学问）跟孔子的思想在原理和出发点上都存在区别。“孔子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从日常生活中总结出了信仰的标准，同时又提出了另一个标准——希望人们能够生活下去且获得幸福。根据孔子的观点，践行孝道、缔结婚姻和对祖先的祭祀等等都是统一且不可分割的。”(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 347)

格氏举例说明了古代中国人的学问跟孔子思想之间的区别——古代中国人对父母的尊敬更多源于对惩罚恐惧。事实上，不管是父母生前还是死后，他们都以某种精神实体存在着。根据孔子的观点，即使父母不要求子女，他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父母。因为一方面他们能够在其中找到满足感，另一方面他能够提高自己的品行，从而确保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处于最佳的状态。

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根据格氏的观点，孝道是儒家的最基本的原则，是所有人类关系的基础，也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先决条件。格氏指出，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人们生活有两个根本基础：一是人类对死后灵魂永存的朴素信念（这与古罗马家长制是一样的），二是用儒家哲学的方式阐述对父母的崇敬之情。两种原则其实并不排斥，事实上这两者是同一种东西。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什么时候”被人民群众所普遍认可和以“什么前提”做出了上述的结论。当出于某种原因对灵魂永存的信念崩塌时，对父母的崇敬之情仍然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是确保人世幸福的最佳途径。如果第一个原则是基于对全人类固有的灵魂永存的信念，那么儒家原则就是基于“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更广泛且不可动摇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品质和爱

好，努力争取人世的幸福”（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430）。根据格氏的观点，儒家并不像其他宗教所宣扬的那样，儒家对只能由信仰解释的一切事物都抱有怀疑。但是这种教义在保持了纯粹积极性的同时，相较于其他道德哲学系统，又展现出了对每个人生命力的持续关怀，并以此决定了家庭的幸福，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

4 格氏眼中的儒学特点

根据格氏的观点，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活力的系统，并没有经历过爆发式地发展。很多聪明的人都在努力钻研那些最终被证实是无可动摇的东西。这些聪明的人在基本原理有了有效认识之后，能够钻研的仅仅是整体学问的某个侧面。

格氏认为，孔子的学说并非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真理，而是一个自洽的有牢固群众基础的道德哲学系统。把孔子的学问跟其他哲学流派相比，格氏认为：“……在哲学概念上，孔子学说比古代中国其他的哲学家的学说涉猎更为宽广，在其基本原理和出发点上也表现得更为自然。孔子在多神教徒之间特立独行，他并没有宣称得到了神的旨意，而是在自身实践中总结出来了一套道德箴言。这套箴言被人们认为是与其他哲学系统处于同一水平的。这套由孔子创制的道德箴言一开始就被无数中国人所遵循并践行，相较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或者傅立叶的哲学在狭窄圈子内流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更为宏大的哲学叙事。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成了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智慧的化身；作为一个伟大的道德家，又被最广泛的普通民众所接纳。”（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352）在孔子的思想中，普通人能找到保守的一面，而受过教育的人能找到积极的、富有哲学深意的一面。

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是孔子学说所不具备的。孔子学说本质上是积极的，它仅考虑了地球上现存的客观条件和人类生产所导致的主观活动。根据孔子的说法，人类生活作为一个既定事实，不需要被肯定或者否定，它自身便是一种适用于某种目的而存在的。一个人如果想要充实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他就需要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现实性处于最佳的联系状态之中，一方面考虑自然法则的要求（本能和需求），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周围人的要求。

儒家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以下五个范畴：一个人与父亲的关系（即父子有亲）；与兄弟的关系（即长幼有序）；与妻子的关系（即夫妇有别）；与朋友的关系（应该理解为在同一个社团、公司、车间等内部的成员，即朋友有信）；与领袖的关系（即君臣有义）。儒家认为，这些关系是基于一个人对个人幸福感的渴望。而孝道可以使一个人在爱情、维持公平正义和其他积极的社会活动中得到肯定，从而确保他在生活中能够获得这种社会幸福感。

格氏认为儒家思想与公认的宗教理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基督教许诺一个人死后能上天堂，他们指示人们将人世的生活视为一种预备性的工作，不要被人世的种种美好所吸引，摒弃生活中的琐事，随时为了天上的生活而牺牲人世的一切。

“儒学思想是整个中国生活秩序的根源。因为有了这种思想使得这个庞大帝国仍然不可动摇。每个中国人，甚至在海外的中国人，其所言所行中体现的儒学思想无不体现出一种可以令外国人震惊的生命力和合理性。”（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2015：435）

5 结语

格氏积极地评价了中国人的传统，认为在儒家思想中，中国人看到了对“人”的肯定，并在此基础上伸张“人”的权利，从中汲取力量，使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长期存在并且繁荣富强。

附注

1 本文编译自 К. П. Каменева 于 2016 年发表的学位论文《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к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 в труда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синологов》中有关 Л.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的部分。

参考文献

- [1]Васильев В.П.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 Санк-Петербург: Институт Конфуция в СПбГУ, 2013.
- [2]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 Конфуций и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М]. Москва: URSS, 2015.
- [3]Jean Joseph Marie.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М]. Paris : Gey : Gide, 1776-1814.

Confucian Studies in Russian Sinology: Georgievsky

Luo Xue-xin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Georgievsky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sinologist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Guided by Vasilyev, he had his own unique judgment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Based on his monograph,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Georgievsky's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Keywords: Russian Sinology; Confucianism; Georgievsky

译者简介：罗学鑫 (1996—)，男，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2019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2020-12-30

[责任编辑：靳铭吉]